



吉林党史人物

外真



第七卷

吉林党史人物

外真
一九八九年

第七卷

吉林教育出版社

吉林党史人物 第七卷

江涛 主编

责任编辑：任毅馥

封面设计：曲 刚

出版：吉林教育出版社	850×1168毫米32开本	11.5印张	4插页	268 000字
发行：吉林省新华书店	1991年8月第1版	1991年8月第1次印刷		
	印数：1—3 378册	定价：5.75元		
印刷：长春新华印刷厂	ISBN 7-5383-1400-8/K·49			

《党史人物》编委会

主 编：江 涛

副主编：邱振声、周兴、赵沛霖、王德贵

编 委：（以姓氏笔划为序）

马春阳、王 霖、王玉琳、王德春

刘国梁、金城镇、郭红婴、徐学新

曹介民

本卷主编：曹介民

出版说明

编纂出版《吉林党史人物》，是为了缅怀革命先辈们的革命精神和业绩，对广大党员、群众和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。此项工作自1987年经省委同意后，我们就着手组织各方面的有关人员，搜集史料，进行撰写。

《吉林党史人物》拟分10卷，用3至5年时间完成全部编辑出版任务。收入此套书的人物范围是，凡在我省战斗、工作过或出生于我省在外地工作的已故或牺牲的中共党员，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予收入。

1. 1931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前，在我省从事革命活动，而且影响较大的共产党员；

2. 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抗日战争时期的副县（团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；

3. 解放战争时期的副地（师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；

4.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副省（军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，或“七·七”事变前参加革命的副地（师）级以上的党员干部；

5. 凡经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或省委、省政府正式命名的党员英雄模范人物（“文革”期间命名的一般不在其内）；

6. 各个历史时期各条战线（包括党的地下工作战线）上影响较大、业绩突出的优秀共产党员。

按以上范围,《吉林党史人物》1—10卷,计300人左右。

本套书力求事实准确、清楚,文字通俗、精炼。建党早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党史人物,每人一般5000字左右,个别特殊人物不超过1万字;解放战争时期的党史人物,每人一般1万字左右,个别特殊人物不超过1.5万字;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党史人物,每人一般在1.5万字以内。

在撰写过程中,为了体现地方党史的特点,对传主一生革命活动的叙述,采取简叙一生的活动,详叙在吉林活动的写法。对传主的缺点错误一般不写,必须写的重要政治性错误,遵循党的两个历史问题《决议》的精神,有结论的按结论写,有几个结论的按最后结论写。

本书的目次按牺牲或逝世的时间先后排列。

由于年代久远,资料不全,加之我们的水平有限,缺乏经验,难免会有缺点和错误,恳请广大读者特别是知情的老同志指正。

《吉林党史人物》编委会

1989年12月12日

序

李砥平

在省委的关心和支持下，经过各级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的努力，《吉林党史人物》第七卷与广大读者见面了。

《吉林党史人物》，按第一、二次国内革命战争，抗日战争，解放战争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，将分10卷陆续出版。其中，收入了在我省战斗和工作过，已故或牺牲的300多位共产党员的生平业绩。

编纂和出版《吉林党史人物》，是为了缅怀和弘扬革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的革命精神，向广大人民群众，特别是向广大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、社会主义和艰苦奋斗的教育，提高民族自尊心 and 自信心，激励革命精神，发扬革命传统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奋斗。这是一件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事情。

吉林省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省份。在长白山麓、松花江畔和西部草原上，到处都留下了革命先辈们的足迹和血汗。我省第一位共产党员马骏，1924年在吉林大地上播下了革命火种。第一次声势浩大的声援“五卅”反帝爱国运动，1925年在城乡各地爆发。第一个苏维埃政权，1930年在延边药水洞出现。第一支抗日革命武装磐石游击队，1932年在磐石建立。杨靖宇等抗日名将，率领抗日联军，与敌人进行了多年的浴血奋战，威震敌胆，名扬中外，受到广大群众的崇敬。解放战争时期的“四保临

江”、“三下江南”和“四战四平”等举世闻名的重大战役，都在我省进行，至今吉林人民仍然引以为荣。

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，都有许多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，为了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刻苦辛劳的工作，献出了毕生的精力、心血乃至宝贵的生命。在战争中，他们驰骋于疆场，出入于枪林弹雨之中，不怕流血，不怕牺牲，临危不惧，前仆后继，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斗争。在敌人的监狱中和刑场上，他们坚持革命气节和情操，不怕酷刑，不为利诱，甚至视死如归，从容就义。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的地下工作中，他们凭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和必胜的信心，深入虎穴，处险不惊，在随时都有坐牢、杀头的危险面前，把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，机智勇敢地与敌人进行了复杂艰险的斗争。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，有些同志在蒙冤受屈的时候，仍然顾全大局，毫无怨言，坚持战斗，积极工作，直至英勇牺牲。在社会主义建设中，环境变了，地位变了，他们的共产党员本色不变，艰苦奋斗的传统不丢。以表率、先锋和模范作用，奋战在各条战线，辛勤地耕耘了这块美好的吉林大地，为国家的繁荣富强奉献了自己的一切。有些同志几经坎坷，甚至在“文革”中遭到严重迫害，但是他们对党的忠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毫不动摇，矢志不渝。这些党史人物，谱写了许多感人肺腑、催人泪下的壮丽史诗，留下了无数惊天动地、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

在无数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身上，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。他们坚定地信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和马列主义革命真理；有高度的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气节；有以革命为己任，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，毫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，大公无私，先人后己的高尚品质；有英勇无畏，披荆斩棘，百折不挠，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；有不怕困苦，

不畏艰险，坚韧不拔，革命加拼命的自我牺牲精神；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密切联系群众，理论联系实际、实事求是，艰苦奋斗、廉洁奉公的优良作风；有顾全大局，服从组织，遵守党的纪律的高度自觉性。所有这些，都是革命先辈给后人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，是我们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，也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教材。

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我们要永远记住，我们能有今天，是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。我们要十分珍惜他们用鲜血写成的历史，永远崇敬和怀念他们的英名和业绩。

现在，我们党正在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群众，继续坚决贯彻党的“一个中心、两个基本点”的基本路线，以坚定、豪迈的步伐跨入20世纪90年代，为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的宏伟目标，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。这个伟大的目标的实现，任务是十分艰巨的，前进的道路是曲折的。过去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，教育了千千万万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人民，推动了革命事业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。今天，他们的光辉业绩和革命精神，仍然是激励和鞭策我们向伟大目标迈进的强大精神力量，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腐败斗争的锐利思想武器。让我们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，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，以他们为榜样，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，为振兴吉林、建设吉林贡献出自己的一切。

目 录

吴 瑛 (1910——1967)	李永胜 (1)
雷鸣玉 (1920——1968)	史文勤 (15)
王昌荣 (1918——1968)	崔景瑞 (34)
周秀清 (1900——1969)	张 晶 (49)
高闻天 (1907——1969)	罗兴华 曹志 (68)
关俊彦 (1885——1971)	姚作起 (78)
朱德海 (1911——1972)	李昌役 (93)
崔竹松 (1916——1973)	姚作起 (110)
李 都 (1916——1974)	冯有礼 (117)
李向之 (1900——1976)	罗兴华 曹志 (138)
张永振 (1922——1977)	崔成哲 (151)
张文海 (1905——1978)	刘宇实 (164)
张靖华 (1911——1981)	王镇禄 邹书云 秦德相 (184)
潘志山 (1951——1983)	赵 刚 (205)
吴学周 (1902——1983)	刘宇实 (211)
陈 鸽 (1958——1984)	汪海玉 (226)
徐寿轩 (1897——1985)	佟威亨 (232)
李梦龄 (1903——1985)	李 英 (247)
王奂如 (1907——1985)	孙松江 (267)
肖丹峰 (1902——1985)	王 霖 (286)
王大经 (1913——1985)	王镇禄 周铭学 李力 (308)
李守善 (1915——1986)	陈 智 (325)
何 礼 (1912——1986)	曲天民 (338)

吴 瑛

(1910—1967)



吴瑛，原名吴家蓉。1910年6月10日生于云南省昆明市的一个官宦之家。她父亲那一辈当中有3人系满清光绪年间科举出身，曾去美国和日本留学，并在国外先后加入了兴中会、同盟会。回国后，在云南为推翻帝制、建立民主政府作过贡献。由于父辈较早地受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影响，因而对吴瑛的成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(一)

吴瑛9岁以前随养父在云南、天津、北平等地生活。1919年入云南省立师范学校附属小学。1923年考入云南新制女子中学。她聪慧好学，行止庄重，在学校中是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。当时昆明社会上，新旧意识互相排斥，吴瑛常以“着时装，剪短发，读洋书”来表示对封建礼教的蔑视。她在高中学习时，适逢护法军讨袁取得胜利，云南民主与革命的气氛很浓，革命形势和进步思想给少女时代的吴瑛以很大的感染。

中国共产党成立后，云南很快兴起各种形式的革命活动。吴瑛所在学校中，共产党组织与国民党右派分子斗争很激烈，她经常利用自家的方便条件掩护革命同志，提供革命活动场所，并保存、传递党的文件和进步刊物。当时学校教师中有许多是北平大学毕业的学生，其中有些人亲身参加过“五·四”运动。他们经常向学生宣传“五·四”运动的伟大意义，介绍新思想、新文化。在他们的影响和指导下，吴瑛阅读了许多进步刊物和革命理论书籍。如创造社的《创造月刊》，未名社的《语丝》、《莽原》，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，郭沫若的《女神》，以及倍倍尔的《妇人与社会》，柯伦泰的《新妇人论》等。这一时期，她初步确立了妇女解放的观念，为她后来在上海从事妇女抗日救亡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。

在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中，云南也同全国一样处于腥风血雨之中。吴瑛目睹了女共产党员赵琴英被杀害情景后，敌人的反动、残暴、共产党人大义凛然的英勇气概，在吴瑛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激发了她投身革命的决心和勇气。1928年春，青年学生李生萱（即艾思奇）从日本回到家乡昆明，在共产党员李国柱的领导下开展学生运动，吴瑛受其影响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青年互济会，开展党的外围工作，思想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，她在日记中写道：“已走出了象牙之塔，来到了十字街头”。她的追求和行动表明：已经开始踏入革命征程。

1930年5月，吴瑛考入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，不久应李生萱的邀请，同往日本留学。到东京后，吴瑛入东亚日语补习学校，9月考入外语学校，继续补习日文。1931年春，吴瑛考入日本奈良女子高师。30年代，马克思主义开始在留日学生中普遍传播。中共东京支部在留日学生中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，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。吴瑛从中受到了熏陶。1931年7月，她与李生萱一同从

日本回到上海度暑假。同年9月，与李生萱之父李日垓同返日本，继续上学。

(二)

1931年，“九·一八”事变爆发，在留日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。他们怀着极大的民族义愤，纷纷要求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。1931年10月，云南省留日学生在东京集会，商讨归国问题。在这次聚会上，吴瑛与中共党员有了接触。1932年1月，吴瑛同李生萱等留日学生毅然弃学，回到上海。起初，吴瑛拟入暨南大学，继续读书，不久“一·二八”事变发生，吴瑛随同暨南大学撤至苏州。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侵略和民族的危机，吴瑛打消了求学的念头，决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。同年3月，吴瑛回到上海。

1933年夏，吴瑛结识中共党员何云和刘芝明。经何云介绍，吴瑛参加宋庆龄领导的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，任文书、交通。23岁的吴瑛，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。不久，“同盟”被国民党强行关闭，她转入“同盟”法南区分部，继续从事救亡运动，几次险遭被捕。分部复遭解散后，刘芝明介绍她到《江南日报》社任副刊编辑。刘芝明被捕后，副刊取消，吴瑛失掉关系。此时，白色恐怖笼罩上海，所有与吴瑛来往的革命同志（有些是共产党员），有的被捕，有的找不到下落。白色恐怖并未使吴瑛畏怯，但接不上关系却使她十分苦恼。她只好等待机会。这段时间，她当过翻译、家庭教师，还学过俄文和钢琴。

1935年，钱俊瑞到上海不久，在党的上海文委领导下，与陶行知、曹亮组织了进步文化团体“苏联之友”社。同年5月吴瑛经曹亮介绍，参加了该社领导下的一个妇女小组。在这里，吴瑛

认识了文艺界较有名气的青年妇女郁凤、王素、陈波儿等人。她满怀革命激情，积极开展上层妇女的抗日救亡工作，还常用“歌三”、“吴佩兰”的笔名在《大公报》、《大晚报》发表抗日救亡、妇女解放的文章。同年12月，为适应斗争需要，吴璩与王素、陈波儿等人在妇女小组基础上，发起成立了“上海青年妇女俱乐部”，归“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”（简称‘社联’）领导。吴璩先后任交际股长、总务股长、妇女问题研究组长等职，负责许多重要工作。她与其他同志一起，走街串巷，深入到上海的许多里弄中去，组织动员广大妇女，特别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上层妇女走出家门，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。

1935年前后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，妄图把中国变成日本的殖民地。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，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《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》（即“八一宣言”）。在“宣言”的影响下，北平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运动。与此同时，上海的爱国救亡运动也蓬勃发展。1935年12月，由沈兹九、胡子婴、罗琼、陈波儿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了“上海妇女救国会”。1936年“三·八”节，吴璩积极参加由“妇救会”组织的示威游行，争取妇女救亡运动合法化。吴璩此时虽没有参加“妇救会”，但“青年妇女俱乐部”与“妇救会”在救亡工作中有很密切的联系，因此吴璩结识了史良、沈兹九、胡子婴等妇女界领导人物。在她们的影响和带动下，积极开展工作。

1936年11月，“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”（简称‘全救会’）的“七君子”被捕，上海许多救亡团体遭到破坏，“妇救会”的工作也受到很大影响。吴璩接受“妇救会”的邀请，正式参加妇救工作，任理事。此时，“青年妇女俱乐部”因平时秘密工作掩护得好，活动方式较为公开，所以在白色恐怖中，不仅没有受到破坏，反而利用有利条件扩充会员、发展了组织，工作日趋活

跃，一度成为上海妇女界救亡工作中的重要力量。

芦沟桥事变后，为配合抗日战争，“青年妇女俱乐部”改为“青年妇女战时服务团”，吴瑛任干事。1937年下半年，为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高压政策，争取抗日救亡运动的合法化，上海妇女界抗日团体利用绥远抗战胜利的机会，发起组织“上海妇女儿童绥远抗战北上慰劳团”。吴瑛负责宣传鼓动、慰劳品的募集，以及与新闻单位的联络等项工作。慰劳绥远抗战前线将士的活动，很快影响到全国，北平等地也组织了这样的活动。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。“八·一三”抗战后，为扩大抗日宣传，吴瑛与王里、郁风、胡首旺共同出资，合编《战时妇女》旬刊，王昆仑曾资助一部分经费。与此同时，吴瑛还参加了由沈兹九、罗叔章与两江校长陆礼华共同组织的“妇女宪政促进会”，任救济股长，管理一个难民收容所；还参与了上海妇女界的制宪斗争。

吴瑛投身于抗日救亡工作，为推动上海妇女界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贡献，自身也受到了锻炼和考验。但在革命实践中，吴瑛深感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低，对党的政策和策略也知之不多，以致作为一名妇女运动的组织者，常觉力不从心，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。因此，她渴望有一个学习革命理论的机会。正在这时，上海文委接到中共中央指示，组织一批文化界人士到延安工作。吴瑛经组织同意，随同周扬、李生萱、何干之、李楚离等奔赴延安。从此，吴瑛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。

（三）

吴瑛于1937年10月15日抵延安。她被分配到陕北公学生活指导委员会文化教育科，任科员，不久转入教务处工作。当时，“陕

公”初创，正是缺人之时，她放弃了马上参加学习的要求，向组织表示：“愿意在这里工作一个时期，等‘陕公’建立起一个相当的基础，再要求给我学习的机会。”表现了以大局为重，服从工作需要的革命精神。1938年2月，经周扬、李生萱介绍，吴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。同年6月，调入中央组织部训练班。不久，到陕甘宁边区儿童保育分会宣传科，任科长。3个月后经组织批准，入马列学院学习，实现了多年的愿望。马列学院是一所专门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学校。吴瑛在这里较为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、政治经济学、中国革命史、西方革命史、联共党史，以及党的建设理论等课程，感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，心胸豁然开朗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她努力钻研，勤于思考，加上有很好的文化基础和实践经验，因而接受理论知识很快，革命觉悟也迅速提高。1939年8月学习结束后，吴瑛参加了由中央干部教育部派出的实习团，到陇东庆阳、合水、曲子等地实习区、乡党的工作，任小组长。后于1940年5月，又入马列学院学习。在学习过程中，她有意识地结合以前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，注意从理论上寻找答案和解决的方法，收到显著效果，从此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。

1942年1月，中央调查研究局政治研究室需充实合适人员，吴瑛因懂日、英、俄3种外语及具备其他条件，被选调政治研究室敌伪组研究员。她在这里研究、编写、东北沦陷区的经济资料，做了很多工作。1943年4月，调回中央研究院（即马列学院）。同年5月，根据中央决定，中央研究院并入中央党校，改名为中央党校三部。吴瑛曾任三部学习支部干事、支书等职，同时参加了延安整风。

在整风运动中，为打击潜入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，纯洁组织，中央决定结合整风进行审干工作。但是，由于党中央对敌情

估计过于严重，未能及时纠正审干工作中已经发生的逼供信错误。特别是当时负责审干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员、社会部长康生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，掀起了所谓“抢救失足者运动”。他极端地夸大党内和边区内部的敌情，大搞逼、供、信的过火斗争，使运动离开了正常的审干工作轨道，混淆了敌我，造成许多冤假错案。后来，中共中央通过《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》，纠正反特扩大化的错误，并对受冤屈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。吴瑛参加了甄别、复查、结论等整个审干工作过程，历时两年多。在工作中，她严格按政策办事，核查问题严肃认真，为使蒙受冤屈的同志尽快得到平反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。同时，在这一工作中，还学习、掌握了干部工作、组织工作，以及思想教育工作的许多经验、方法，提高了政策水平，自己的思想也得到很大锻炼和改造。尤为可贵的是，她认识到干部是革命事业的宝贵财富，树立起珍惜干部、爱护干部的思想。

（四）

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，中国共产党中央针对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仍坚持独裁，阴谋发动内战的新形势，及时制定了“向北发展，向南防御”的战略方针，吴瑛随第一批进军东北的干部队伍，于1945年9月从延安出发，在路上历经艰难，步行两个多月，于11月中旬抵达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沈阳市，组织上临时分配她到沈阳联合中学任秘书，旋即分配到辽东省委组织部，任干事。在这里她参加省委组织的3人巡视团，到基层检查了解工作。1946年4月，国民党军队向本溪进犯，吴瑛于4月下旬随东北局从本溪撤至长春，东北局组织部安排她到吉北地区舒兰县委，任县委常委、宣传部长，并兼任土改工作队长。